



博士论丛

赵伯雄 著

博士论丛

周代国家形态研究

周代国家形态研究

湖南

2503

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31.2503
381



周代 国家形态研究

赵伯雄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55104

周代国家形态研究

赵伯雄 著

责任编辑：姚莎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092毫米 32开 印张：10.75 字数：220,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

ISBN 7—5355—1097—3/G · 567

定 价：5.40元

总 序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批学有功力、才华横溢、富于开拓精神的中青年学者正脱颖而出。他们或潜心于某一专题的研究，或驰骋于广阔的学术领域，其成就为中外学人所瞩目。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或即将获得国内外的博士学位。为了及时反映和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将有选择地、但又不拘一格地编辑出版一套《博士论丛》，专门用以印行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有关毗邻、交叉学科的优秀博士论文或水平相当的著作。

当今知识更新之高论邀宠，信息爆炸之危言耸听，我们淡然于好新骛奇，无意于时髦文化的追求，这并非藐视各种新的尝试，实为强调学术根基之坚实。那些踏踏实实耕耘于学术之一隅、又心领神会于存在之整体的作者，才是我们最珍视的力量。我们惟愿为推进学术而效力。真正的学术，决非图一时一地之热闹，而需求有恒久性和世界性的作用。研习国故，不拘于考据、训诂，而要能通古今历史之至变，究人生社会之真义，启迪读者之心扉；治理

317-B/34

学术，则不限于述评、比较，要在体悟和理解中西文化之本源，与各民族宗师哲人交流。真正的学术是一种对话，不仅与国人、今人对话，与洋人、后人对话，而且不断提高对话的层次，就学术的进步来说，这是使我国民族文化立于世界之林的关键。创新而不止于移花接木，引进而不孜孜于搬弄新术语，首先要在学术上有深厚根基，然后才能开出自己的花朵。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没有多年自甘寂寞的艰苦劳作，是决不能达到的。但愿《博士论丛》的撰稿人与我们一起，逐步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相信，不屑于赶时髦、凑热闹的读者会理解我们的用心的。

“五四”运动后，也是一批青年人起而顺应世界文明大势，以新的眼光整理传统文化，移植西方文化，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奠定了基，其中许多人日后成为学贯中西而又自成一说的名家。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西文化再次相遇和撞击，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创造性大发展提供了契机，而新一代的中青年学者在此大发展中，必将发挥其中坚作用。我们有理由期望，《博士论丛》的撰稿人中也会涌现出不逊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大学者•

《博士论丛》编辑委员会

1987年7月于北京

《博士论丛》编委会

主编 叶秀山

副主编 周国平

编委 (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宁 王友琴 王润生 刘 东

苏 智 何怀宏 张维平 姚莎莎

韩小葆

目 录

序	李学勤
绪论	(5)
1 西周“天下”的政治格局	(13)
第一节 周邦与万邦并存	(13)
第二节 庶邦及其分类	(19)
第三节 周邦、王畿异同辨	(26)
第四节 《周礼》中的周邦与庶邦	(40)
2 邦家——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统一	(48)
第一节 邦的外部形态	(49)
第二节 从所谓“国姓”谈起	(51)
第三节 从氏族到宗族	(61)
第四节 邦的内部构成	(71)
第五节 宗法制与国家形态	(79)
3 王室与邦君	(91)
第一节 西周国家的主权结构	(93)
第二节 主权、土地所有权及职责	(104)

第三节	关于所谓五等爵制(120)
第四节	巡狩制度考(134)
第五节	监国制度考(146)
4	城市与乡村(158)
第一节	从“国”字的古训看西周所谓国野制度(160)
第二节	“国人”的身分问题(171)
第三节	西周城市与乡村的无差别统一(185)
第四节	一邦之中的大邑和小邑(200)
第五节	周代城市国家说驳议(206)
5	从分权到集权(220)
第一节	天子的衰微与诸侯的成长(221)
第二节	春秋诸侯国家的形态特征(225)
第三节	宗族制度的解体与“士”阶层的崛起(237)
第四节	集权政治的滥觞——邑宰（家臣）政治(244)
第五节	集权政治形成的契机——俸禄制度的改变(252)
第六节	集权政治形成的标志——郡县制的确立(259)
6	周代的君主政体(276)
第一节	关于周代政体问题的不同意见(278)
第二节	从父家长到邦君(282)
第三节	专制主义与君主政体(286)
第四节	周天子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291)
第五节	《左传》中所见之诸侯国君(301)

一、国君与社稷.....	(301)
二、国君与“政”.....	(306)
三、关于立君权问题.....	(318)
第六节 民主政治说商榷.....	(321)
第七节 君主政体之趋向成熟.....	(328)
结论.....	(332)

序

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赵伯雄同志的专著《周代国家形态研究》即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列入《博士论丛》出版，令人欣喜。这是一部颇具学术特色的书，伯雄同志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是很乐于从命的。

伯雄同志从学于王玉哲先生。王先生专研中国古代史多年，成果极多，对西周史尤有精湛研究。在他指导下，伯雄同志的博士论文《周代国家形态研究》，重点也在于西周。这种情形，从中国古代史本身的特点来说，并不是偶然的。我国古史，以夏、商、周为三代，或加上虞为四代，但西周以前文献缺乏，《尚书》中的《虞、夏书》、《诗经》中的《商颂》等，成立时代多有争论，数量也很少，进行研究的依据不得不侧重考古学以及古文字学。有关西周的文献较之前此为多，且多足以信据，从而探索古史必当着眼于西周。由之上溯夏、商，下及春秋、战国，始能贯通。特别是国家形态问题的探讨，西周时期是一关键。伯雄同志本书抓住这一点，作出深入的分析讨论，对促进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是很有裨益的。

就世界的范围来说，人类的古代史复杂曲折，千头万绪，然而其间具有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并不是很多。有数的这样的古代文明，又多早已中断、消亡，惟有中国古代文明得以绵延久远，形成独特的历史传统。要详细认识中国古代史的发展道路，有必要以世界史为背景进行比较研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于历史原因，没有涉及中国。一九二九年，郭沫若同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为职责，声明要作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伯雄同志的书，无论在主题还是方法上，都是在这一研究途径上继续前进，取得新的进展。

读者翻阅本书，不难发现作者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作了新的探索和论证。以下试举几点，作为例子。

第一章论西周所谓“天下”的政治格局，强调指出当时周人没有后世史家所说“周朝”、“周王国”这样的观念。他们认为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因为周人的知识水平有限，他们眼中的“天下”即相当今天讲的世界，而由今人来看，“天下”不过是世界中的一个国家。这个论点说穿似乎平常，却澄清了某些古代史著作里存在的种种混淆。再如伯雄同志说：“西周国家既然是当时人心目中的‘世界’，自无具体的疆界可言。”更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推论。

与此有关，伯雄同志提出，在西周，国家主权与土地所有权这两种权力尚未明显地划分开来。“从金文材料来看，西周是不存在土地国有(王有)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作为土地王有的证据。”五十年代，侯外庐先生曾特别指出，在研究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形态时，要注意所有

权、占有权、使用权一类范畴的涵义和区别。从同样角度考虑，国家主权与土地所有权这两个范畴相互关系的研究，自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伯雄同志关于“西周至春秋血缘组织依然保留着，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的论述，也很值得注意。类似的见解过去有不少学者提出过，如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而伯雄同志本书关于“邦”、“家”、“宗”、“族”、“姓”、“氏”的讨论，吸收了近年的学科成果，更为详密。对血缘纽带如何松弛崩坏，也有更丰富的论证。

有关西周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讨论，也是本书精采的部分。伯雄同志对于“国野”、“国人”以及城市特点的看法，很有特点。他还不同意城邦国家的学说，主张西周的“邦”与古希腊的城邦“在城市的性质、人民的身分等等方面差异非常明显，因此在谈到周代国家形态时还是以不提城邦（城市国家）为好”。大家知道，认为中国古代也存在类似希腊的城邦的见解，四十年代已有滥觞，近年更有一些学者作了深入的阐述，其中包括在台湾的学者。本书所持反对意见，无疑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论著汗牛充栋。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须是多学科、多层次的，这便要求把握其中的核心问题，以求在广博的基础上做到逐步深入。本书综合历史、考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研究，融会为一炉，导出自己的结论，条理细密，如剥蕉抽茧，读来令人感到有说服力。我相信，不管您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持怎样的看法，都应当读读赵伯雄同志这部《周代国家形态研究》，这是我从个人体验而

作的推荐。

李学勤

一九八九年十月

于北京昌运宫

绪 论

一

本书研究的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问题。我所谓的“国家形态”，简单地说起来，就是“国家的具体的样子”。本书所要回答的，是“中国早期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问题。

古往今来的国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给予了充分的论述。

古往今来的国家，在形态上是各异的。就国家的规模及其结构来讲，有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也有方五六十里的蕞尔小邦；有各部分完全听命于中央的集权国家，也有地方各自为政的松散联邦。就国家的政体来讲，有共和制的国家，也有君主制的国家；有民主制的国家，也有贵族制的国家。从国家的成熟程度来看，有早期的、比较原始的国家，也有成熟的、比较典型的国家。

国家在形态上的种种差异，是基于各个民族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不同的。在这里，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方

式、自然地理条件、民族的传统心理素质、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形式。

从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国家中归纳出它们的共同的特质，指出国家的共性，揭穿剥削阶级学者为掩盖国家的暴力性质及压迫功能而散布的种种谎言，这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具体地描述每一个具体的国家的实际面貌，指出每一个国家产生、成长、灭亡的具体路径，指出一个国家区别于别的国家的特征所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实质的理论变得有血有肉、变得更加令人信服，这则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

于是有了这本《周代国家形态研究》。

中国的早期国家，即旧史所谓“三代”。夏代是否存在，过去曾经一度成为问题。目前，虽然考古学上的成就还没有为夏代的存在提供确凿的人所公认的证据，但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夏朝”，现在是很少有人怀疑了。按照一般的说法，夏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从典籍中关于夏朝的记载来看，这或许是事实，但对这最早的国家的进一步的详情，我们所知实在太有限了，我们所能做的，至多是根据历史传说及商代的物质文明状况，做一些推测而已。商代的情况要好一些。有了大量当时的文字材料出土，这就是甲骨文。甲骨文的出现，在古史研究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商史研究建立在了实物证据的坚实基础之上，讲究实证的史学家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议论商代

如何如何了。然而作为史料，甲骨文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出土的数量成千累万，但由于卜辞本身的性质，所能说明的问题是有限的。而且材料也过于断烂，文字也过于简略，极容易引起解释上的歧义。因此，不能指望依靠甲骨文把商代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弄明白。事实上，就以商代国家形态这个题目而言，这里面的许多问题就远非甲骨文所能说明的。

周代的情况就好得多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比起夏商二代，周的文明又进了一步。这时期已经有了文献记载，流传至今的虽然还嫌少，但毕竟是当时的实录。此外，战国时代的学者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其中也不乏能够说清西周春秋时代社会状况的史料。加之以地下出土的大量彝器铭文，研究周代国家的材料就很可观了。“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商周虽各有损益，但夏商周作为早期国家，自有其制度上传承的一面。既然周代的材料还算比较丰富，我们在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时候，就不妨以周代作为一个突破口，对周代国家的面貌先做一番尽可能详尽的描述。

于是就有了这本《周代国家形态研究》。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不少地方谈到“国家形态”，不过现在大多译为“国家形式”了。现代政治学教科书中差不多都要讲“国家形式”。一般认为，国家形式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是指

国家整体构成的形式，即用何种形式来划分国家内部组成，它说明国家整体与各个构成部分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管理形式，即通常所说的政体，也就是统治阶级组织国家政权的方式。周代的国家，在结构形式和管理形式这两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西周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吗？如果是，它与秦汉以后的统一大国有什么差别？如果不是，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西周到春秋，是所谓城邦时代吗？如果是，中国的城邦与西方古代的城邦是否相同？如果不是，中国古代的城市与乡村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周人喜欢讲“天下”，讲“四方”，这“天下”、“四方”究系何指？指的是一个政治实体呢，还是一个国际社会？周代国家实行的是君主制呢，还是共和制？或者两者都不是，而是一种别的什么特殊的政体？西周天子的权威究竟有多大？战国典籍中所传种种统驭诸侯的政治制度的真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春秋时代诸侯国君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天子与诸侯算不算是专制君主？如果算，他们与后世的帝王有什么区别？如果不算是，那他们算什么呢？凡此种种，都还有讨论的余地。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在前人以及当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新的探索，试图给予合理的解答。不敢说结论一定正确，唯求真实之心与重证据之意，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曾须臾丢开，这一点却是可以无愧于读者的。

除了上述结构形式和管理形式之外，本书所论国家形态，还包含有早期国家的原始性这样一个内容。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自有其本身的特点。国家不是在氏族制度被彻底“炸毁”之后产生的，国家出现的时候，氏族组织的